

第1篇

世纪之末的挑战

20 世纪末，中国和世界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极其重大的事件。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也迫使社会的经济管理体制发生着深刻变革。

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对本世纪末和下一个世纪初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一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呼唤着中国财政与国际惯例的迅速接轨，建立中国公共财政不能不成为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中国财政改革的主题。

第 1 章

转型经济与公共财政

近年来,《美国经济评论》、美国的《经济问题杂志》、英国的《经济政策》、《剑桥经济学杂志》、《世界经济》等刊物,发表了许多研究中国、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转型问题的文章。他们对转型经济中政府作用的探讨,涉猎到改革的思路,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政府采取怎样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保证转型时期经济安全和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等问题。这些探讨对我们研究和思考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有借鉴价值的启示。

从中国的情况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乃是一场深层社会结构内部的制度创新和革命。中国公共财政的建立,既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又是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

1.1 转型经济的理论

1.1.1 转型经济

1. 转型

转型一词，英文用的是“transformation”，社会转型，即为“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转型”按牛津辞典的解释，它是变形、变性、变迁、变质、转变的意思。具体说，转型强调的是社会总体结构及其存在形式基本性质的转变，是社会的规范性模式转换。广义的转型定义应着眼于整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强调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实践主体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重大社会问题，在社会不同领域，以各种不同的社会变革行为和创新活动，从文明基础、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等不同角度，乃至社会整体上，对原型社会进行变革，以求实现符合社会进步目标的结构模式的根本转变^①。

广义的转型定义已包含了对转型类型的划分。依据生产力发展的“长波”理论，由此可以将社会转型划分为几种层次类型：从生产力历史形态的演进角度，划分出的人类文明的转型，即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更为高级的“后工业”文明（或称为信息社会文明）的转型；从社会形态依据受生产力制约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态划分出的社会形态或叫做根本的社会制度的转型，如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与更替；从社会生产力发

^① 刘玲玲：《社会转型的类型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4期，第15页。

展水平及其制约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出的社会体制转型，如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的从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到西方各国各具特色的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体制的转型等等。本文研究的转型主要着眼于社会体制层面，重点考察诸如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二战以来，世界各国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体制经历的转型，既表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又呈现出多元化的转型模式。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看，以英美为代表的“内源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发展模式，即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道路，即“内源性变迁”（endogenous change），资本主义经济以“个体本位”和“市场本位”为前提，通过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经济体制逐渐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向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现代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通过选择适宜的制度安排，形成了较典型的发展模式^①。英国学者达伦道夫曾对西方发展模式有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西方社会的特点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制度，而是对各种制度进行选择的一种方法——一种自由的、尝试性的、可以通过消除错误而在制度选择方面进行学习的方法。

由于历史和现实诸种因素的制约，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失去了走西方“内源型”发展模式的机遇，只能通过“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道路，即在国际环境影响之下，社会受到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 and 政治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深化。“外源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发展模式，从历史过程看来，经济欠发达（under developing）国家，一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非西方民族文明与社会形态演化造成的一种特殊形态，即一种依附形态；另一方面又是这些国家近代以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23～125 页。

来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开放国门，向西方学习，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发育市场，建立市场体系和国家的工业体系，寻找一条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历史的视野观察，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能不说是欠发达国家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深刻的社会形态和制度的抉择。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依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以“集体本位”和“计划本位”为前提和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这一体制选择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并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行政命令配置社会资源的低效率，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和思想动员的激励机制扼杀了微观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进行改革，试图探索出一条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和模式。

进入 90 年代，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采取了激进的社会转型模式，迅速转向市场经济，付出较大代价使经济从低谷开始回升。中国自本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到 20 年的努力，经济和人民生活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改善，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其发展速度正为世界所瞩目。目前，东西方各国十分关注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转型，将其归为“转型国家”或“转型经济”类型，并广泛和深入地探讨着转型国家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为概述方便起见，依据现代化理论将经济发展模式大体分为三大类型：即西方发达（developed）国家、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underdeveloped）国家、原实行计划经济的转型经济（economic transition）国家。

2. 转型经济及其本质

经济学家谈到转型经济或经济转型时也用“transition”一词，如转型经济学（the transition economics）或经济转型（economic transition）。目前，从各国学者对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注和研究中可以看出，转型经济或经济转型，即“economic transition”已经成为一个专用词汇，专指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①。这里“transition”或“transformation”，即转型、转换或过渡的意思，在本文中，凡用转型经济或经济转型一词，皆系指经济体制转型这一含义。

转型经济面临的发展问题，明显区别于常规的经济发展。从本质上看，所有处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包括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无不面临着双重的发展目标，即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具体说乃是通过体制转型（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社会生产力，形成有效率的激励机制和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在中国，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转型，本质上又是在近代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历史条件下，超越阶段、合二为一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包含着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双重目标的转型。由此规定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必然同时推进两种类型的转型，即文明转型和体制转型。文明转型系指中国社会在其社会结构中还有相当的自然经济成分，必须在乡村极大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步伐，使中国社会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至更快地融入现代信息社会的文明转型。体制转型则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坚持和

^① Blanchard, O. "Theoretical Aspects Of Transition" Amer, Econ, Rev, 1996.86-2: 117-122.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针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完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文明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同时推进，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转型发展的文明转型表现在体制转型上，集中转变为解决转型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调整体制模式和形成有效率的机制问题。因此，转型的核心内容是体现文明转型内在要求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是新型社会结构的演化创新，这正是体制转型的本质所在。体制的运作关键取决于构成体制的组织结构和要素结构的内在联系，因而社会结构转换的发生机理必然是原有社会结构内外组成要素的重组和新的结构要素的导入。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社会转型的基本形式，是因为它加快了社会结构要素重组和新的结构要素导入的步伐，使社会转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时期。

社会结构变革，塑造着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不仅使原有的结构要素重组，还为新的微观主体的出现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经济体制的转型，带来社会组织分化与流动速度的加快，城乡壁垒逐渐打破，为寻找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规范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转变经济运行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寻求微观的动力基础和制度支持。同时，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也为规范政府行为和界定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分配关系奠定了基础。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社会共识下，公共财政应承担起矫正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也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显然，建立公共财政，既是转型社会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又是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框架的支撑，它的发展必然以促进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与保持活力为其先决条件。随着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强化，转型经济建立适合国情特点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使之成为 21 世纪转型国家对人类制度文明进步的新贡献

以及制度文明进步的生长点，将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反映出社会在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抉择中进行的有益尝试，也许，惟有站在这一视角，才能对转型经济与公共财政的内在关系做出合理的诠释。

1.1.2 转型经济的发展阶段

1. 影响转型进程的因素与发展阶段

对转型经济的研究，不能忽略从时间进程上对转型发展阶段的思考。

西方一些研究机构如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EBRD）等，都致力于转型经济的研究，比较一致的处理方式是找出关键因素（key ingredients），通过这些关键因素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来判断转型经济的进程。他们将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①：

（1）市场主体 他们认为企业私有化是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因为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家庭是生产和消费的决策主体，他们必然依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决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只有产权明晰，市场主体才能形成。所有制（ownership）有多种形式和多种维度（dimensions），包括控制权、使用权等，最重要的是分享剩余的权力。私人企业以所有者的明确身份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追求构成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动力。

（2）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应保证有效竞争的实现，而竞争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自由进入市场。市场是企业 and 家庭相互作用的竞争场（arena），是商品交换和资源配置的手段，一个有效的市场

^①姚先国：《东欧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进展与启示》，《世界经济文汇》，1997年，第4期，第7~8页。

应具备如下特点：交易活动覆盖绝大部分商品和劳务，决定所有重要的投入和产出；拥有商品价格和质量的完整信息；价格有弹性；市场竞争性强。

(3) 金融制度 金融机构是市场经济的心脏，它调节和供给市场运动的血液——货币，连接储蓄与投资，评价与配置风险，行使流通和支付职能，强制性地贯彻财经纪律，将计划经济中的预算软约束变成硬约束。没有一套灵活高效的金融体系，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转。

(4) 政府行为 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并没有减少，只是转换了行为方式。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主要的、多方面的作用，包括：建立有效的法律、法规制度，规范企业管理行为，明确产权归属，确立交易规则；提供安全、国防、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等公益产品；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保护环境；提供和保护某些重要财产；征收税赋，以支持上述服务等。总之，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公共财政以规范政府的行为。

此外，他们还除政府行为之外的其他三个因素制定了量化标准，提出了统一的衡量转型进展状况的指标体系。

美国《未来学》1992年刊登V·尼拉古祖以《过渡经济》为题的文章，V·尼拉古祖依据德国经验认为转型经济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①，即：

第一阶段，引入市场基本原则，包括将私有化与强调企业精神、提供个人刺激和市场导向管理一起作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引入市场竞争，取消国有企业的垄断，对世界市场竞争和投资实行开放；经济活动自由化，包括放开价格；经济活动分散

^① V·尼拉古祖：《过渡经济》，美国《未来学》杂志，1992年，第9期，第635～652页

化，减少与之相关的规定。

第二阶段，涉及建立一些基础设施并使之现代化：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发展，以及建立一个计划经济中不曾有过的高效的金融和银行体系。

第三阶段，经济活动在保持生态环境和提高社会意识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

自 1989 年前苏联、东欧各国发生巨变以来，已经过去八九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放弃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效仿西方的议会民主。人们将此变革称之为经济体制转型，英文表达的是“*transition*”或“*transformation*”（即转型、转换或过渡的意思）。由于前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分裂，进入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增加到 20 多个。尽管这些国家历史和现实经济条件不同，原有改革进展状况差异较大，但它们在体制起点、转型目标模式、转型方式等方面，尤其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目标上各国是一致的。同时，转型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在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的变革，以及所有权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变革方面都表现出转型经济的某种发展共性，可以相互借鉴、参考和比较。

从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的实践过程来看，转型经济经历的发展阶段大体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发展时期，即初期、中期和后期。转型初期，采取激进的转型模式，造成经济秩序极度混乱，出现高失业、恶性通货膨胀、以及人们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的情况，使激进改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与此同时，一些转型国家也在动荡中积累经验，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稳定发展的规律性，逐渐走出转型初期的经济困境，向转型的中期阶段推进，探索企业私有化的可行模式，着力推进经济市场化的进程，着手建立市场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推进金融改革，

完成政府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并探索形成稳定的权力中心与和谐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些转型国家能够顺利完成上述改革，转型将顺利走向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再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探索，形成符合各国国情特点的发展模式，完成转型，进入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法制完备，社会稳定，社会将在更高的发展层次上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 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展趋势

从中国的情况看，转型时期，应界定为始于本世纪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完成于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期。在这一整个历史时期中，依据我们党十五大提出的目标，可以将转型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以便于我们深刻把握转型社会的本质和总体特征。

依据我们党分三步走的战略方针，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也要经历若干发展阶段，如早期、中期、后期或称市场经济导入期、深化期、完善期。而每一时期至少要花上十几年、20 年或更长的时间。

前 20 年或称早期阶段，显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缺口，导入市场经济因素，初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阶段。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初步解放所释放的能量，使改革后的经济总产出能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人们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较好地处理了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体制创新推进过程中，通过新经济要素的导入、新的结构单元的出现，加快了市场体系的培育。逐渐积累了妥善解决体制摩擦、错位、缺位以及国民经济结构深层矛盾的经验。通过近 20 年的发展，结束了“短缺经济”的历史。

90 年代的后期，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是转型的深化期。前一个阶段，如果体制改革还停留在攻打外国，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进而通过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体制

外开拓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广大空间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改革必然深入到体制的内部，真正开始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核心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深化财政、金融、投资、外贸等体制的改革，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以及金融监管制度，并配合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等等，都加快了改革的步伐，使经济增长依托于更为有效、安全的制度安排。随着转型的推进，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和人们的观念也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

下个世纪中叶，转型经济在体制创新和经济增长双目标的推进下，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期。整体社会结构的创新在各个方面得以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经济规则和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生活富裕，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转型经济完成历史使命。

1.2 转型经济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1.2.1 俄罗斯的经济转型

1. 转型历程

从 1992 年初俄罗斯开始实行“休克疗法”以来，经济转型一波三折，动荡不安，走过了七八年惊心动魄的转轨历程。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时期，即从 1992 年初~1993 年底。采取的措施有三项，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自由化是指一次性大幅度放开价格，形成自由价格制度；稳定化

是指采取强硬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预算赤字，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私有化是指通过推行私有化政策，对前苏联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根本性变革，建立起以非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混合经济。

“休克疗法”曾经在玻利维亚、智利等小国取得过一定成效，因此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便将此法作为“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企图一蹴而就地解决俄罗斯经济问题。1992年的改革目标提出，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价格稳定下来，生产停止下降，卢布汇率稳定在1美元兑换80卢布左右的水平。然而，到1992年底，国民收入比上年减少了20%，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8.5%，失业人口增加了60多倍，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5倍，其中食品价格提高了上百倍。激进改革前，即1990年的通货膨胀率仅为6.8%，到1991年就已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高达92.7%。1992年政府实行激进改革，原计划物价放开后上涨不会超过3倍，政府许诺只要居民“忍耐6~8个月”；到年底经济即可走向稳定”。结果当月通货膨胀率就达到30%，第二个月高达40%，而全年通货膨胀率则达到2500%，即上涨了20多倍。卢布对美元汇率节节下跌，到1992年底汇率从年初的1美元兑换90卢布，跌至1美元兑换415卢布。人们多年的辛苦积蓄顷刻化为乌有，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俄罗斯上下对“休克疗法”十分不满，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被迫辞职，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执政后仍较完整地保留了“休克疗法”式的转轨战略。1993年4月，叶利钦在全民公决中获胜，试图变本加厉地推行“休克疗法”，最终使政治冲突达到顶点，酿成1993年10月的流血事件。虽然这一事件使叶利钦的政治权力得以巩固，但是无法改变经济受到重创的局面。截至1993年，工业生产比1989年下降了5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了53%，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下降了49%。1993年议会选举中“激进改革派”遭到惨败。俄罗斯政府不得

不宣布结束“浪漫主义的改革阶段”^①。

第二阶段大体从 1994 年开始，也可称之为放慢“休克疗法”进程，实行经济调整阶段。俄罗斯把稳定财政和金融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主要措施是加强宏观调控，稳定财政，制止通货膨胀，制定产业政策等。

新政府“休克疗法”的转轨战略依旧未变，在调整中俄罗斯经济旧疾上又添新疾，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危机。1994 年 GDP 下降超过了 55% 的界限，在工业生产下降的同时，政府为确保降低通货膨胀率，采取了强硬紧缩通货的政策（使 1994 年的通货膨胀率由 1993 年的 896.0% 降到 302.0%），结果使财政危机与紧缩政策互动，引发了新的危机。

由于几年来生产连续下降，亏损企业的比重居高不下，逃税、漏税、抗税现象严重，国家财政税收计划无法完成，财政收支不敷出，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其中 1994 年税收只完成了 70%，在大力压缩国防支出、取消各类补贴等措施下，预算赤字仍高达 626580 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0%，占当年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27%。巨额的预算赤字，在没有理顺财政与银行关系的情况下，弥补预算赤字的资金来源只能是向中央银行“借款”，1994 年的预算赤字 73% 由中央银行贷款弥补，其余由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加大了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压力。再加之紧缩银根后出现大规模的生产滑坡，银行贷款利率成倍攀升，最高达到 100%，甚至 200% 以上，企业成本攀升，困境可想而知。1994 年下半年政府顶住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西方压力，再度放松银根，货币发行量成倍增长。1994 年卢布对美元汇价更是下跌不止，10 月 11 日当天暴跌 845 卢布，比价接近 4000:1，经过“抢救”，到当年底比价为 3500:1。1995 年中央银

^①唐朱昌：《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回顾》，《世界经济情况》，1997 年 10 月。

行规定汇率波动上下限，实行“外汇走廊”制，比价大体维持在 4300:1 ~ 4900:1 汇率猛跌，加大了居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此种情况，再度加快了通货膨胀的速度。

在财政危机和经济状况恶化的同时，投资危机、支付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政治和社会危机，加重了经济状况的恶化，最终使经济走向谷底。由于财政拨款的减少，过度的信贷紧缩，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再加之本国私人资本大量外逃（1996 年外逃资本达 206 亿美元），证券市场的高收益率和过度投机，使本该投资生产领域的资金纷纷流向证券市场，加剧了生产领域的投资危机。从 1992 年开始到 1996 年，比上年投资下降分别为 40%、12%、27%、13% 和 17%。投资连续多年的大幅下降，造成加工业萎缩，消费生产锐减，大量进口商品蜂拥而至。进口商品已占俄罗斯消费品市场的 54%，其中食品为 50%，家用电器为 80%。消费品生产的不景气和民族品牌产品的销售困难，又加深了企业的支付危机和投资危机。

支付危机，不仅表现为企业间拖欠，企业对财政拖欠，企业对职工拖欠，还表现为国家财政对国民的拖欠。1996 年全国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对工资、退休金、补贴金、教育经费的拖欠，拖欠总额达 120 亿美元，平均拖欠每个职工 160 美元。虽然政府已下决心从预算拨款中开始偿还这部分拖欠，但由于财政无力在短期内全部承担这笔巨额支出，以至偿还工作只能进展缓慢。从 1993 ~ 1996 年，俄罗斯外债从 950 亿美元增加到 1270 亿美元，净增 320 亿美元。根据 1997 年预算草案，国家债务还将增加 620 亿美元。1995 年开始，俄罗斯彻底改变了预算赤字向中央银行透支的办法，主要由发行债务来弥补。1995 年预算赤字中 60% 由发行内债来弥补，40% 靠对外借债来弥补，1995 年政府还本付息支出已占 GDP 的比重为 7.3%。尽管杜绝了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直接影响，但这样一来，政府内外债务迅速增加，约 570 亿

美元的内债，1300 多亿美元的外债，内外债加在一起已占当年 GDP 的比重约为 60% 左右，实质上变成了一种隐蔽和潜在的通货膨胀，使通货膨胀的反弹易于一触即发。

尽管俄罗斯经济困难重重，但自从 1994 年开始调整以来，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下降的幅度，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经济出现了新的转机。自 1995 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形势好转已初露端倪，通胀率直线下降，由年初的 20% 逐月下跌，1996 年 8 月份通胀率接近于零。由于企业和居民承受能力的提高，私有经济已有一定的生存能力，再加之政府改变了片面的货币主义政策，自 1994 年下半年起，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在继续控制货币投放的同时，有选择地扶植一些重点部门，如在经济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原材料、能源部门，以及放慢军转民速度，维持并扩大军工企业的武器生产，使这些部门的产品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不断扩大出口带动生产和增加外汇，以稳定国内的财政金融形势，政府试图在控制通货膨胀与制止生产下滑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随着 1995 年以来通货膨胀率的直线下降，生产下滑速度明显减缓。1995 年 GDP 只下降 4%（1994 年下降了 12%），工业产值下降只有 3%，个别行业如冶金、石化还有正增长。1996 年的经济形势基本相同，外贸出口不断增加，外贸顺差扩大，卢布对美元汇率趋于稳定。

1997 年俄罗斯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经济增长由滑坡转向回升。1997 年 1~10 月，俄罗斯经济增长达 0.3%，这是 90 年代以来的首次回升，意味着经济滑坡已达到谷底。工业生产增长中，有色、机械、化工、钢铁和森工等五大部门的产值有 1%~3.8% 不等的增长幅度，汽车工业的增幅一直保持在两位数。90 年代俄罗斯每年进口几百万吨的粮食，1997 年却能出口上千万吨。月通货膨胀率不到 1%，总理预计通胀率全年能控制在 11% 以内。1997 年上半年联邦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重也从